

主编 李天纲

中国国家图书馆藏

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·文学艺术（第二辑）

阿波罗艺术史

[法] 赖那克 (S. Reinach) 著 李朴园 译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

主编 李天纲

中国国家图书馆藏

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·文学艺术(第二辑)

阿波罗艺术史

〔法〕赖那克(S.Reinach)著 李朴园 译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阿波罗艺术史/李天纲主编. —上海: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 2017

(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. 文学艺术)

ISBN 978-7-5520-1797-7

I. ①阿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艺术史—西方国家 IV. ①J110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32176号

阿波罗艺术史

主 编: 李天纲

编 纂: 赵 炬

责任编辑: 唐云松

特约编辑: 陈宁宁

封面设计: 清 风

策 划: 赵 炬

执 行: 取映文化

加工整理: 嘎 拉 江 岩 牵 牛 莉 娜

责任校对: 笑 然

出版发行: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

电话总机 021-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-53063735

<http://www.sassp.org.cn> E-mail: sassp@sass.org.cn

排 版: 上海三联读者服务合作公司

印 刷: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650×900毫米 1/16开

印 张: 34.5

字 数: 450千字

版 次: 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20-1797-7/J.046

定价: 158.00元 (精装)

民国西学：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

——『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』序

李天纲

继唐代翻译印度佛经之后，二十世纪是中文翻译历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时期。来自欧美的『西学』，以巨大的规模涌入中国，参与改变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，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。域外知识大规模地输入本土，与当地文化交换信息，激发思想，乃至产生新的理论，全球范围也仅仅发生过有数的那么几次。除了唐代中原人用汉语翻译印度思想之外，公元九、十世纪阿拉伯人翻译希腊文化，有一场著名的『百年翻译运动』之外，还有欧洲十四、十五世纪从阿拉伯、希腊、希伯来等『东方』民族的典籍中翻译古代文献，汇入欧洲文化，史称『文艺复兴』。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大量翻译欧美『西学』，可以和以上的几次翻译运动相比拟，称之为『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』、『中国的文艺复兴』并不过分。

运动似乎是突如其来，其实早有前奏。梁启超（1873-1929）在《清代学术概论》中说：『自明末徐光启、李之藻等广译算学、天文、水利诸书，为欧籍入中国之始。』利玛窦（Matteo Ricci, 1552-1610）、徐光启、李之藻等人发动的明末清初天主教翻译运动，比清末的『西学』早了二百多年。梁启超有所不知的是：利、徐、李等人不但翻译了天文、历算等『科学』著作，还翻译了诸如亚里士多德《论灵魂》（《灵言蠡勺》）、《形而上学》（《名理探》）等神学、哲学著作。梁启超称明末翻译为『西学东渐』之始是对的，但他说其『范围亦限于天（文）、（历）算』，则误导了他的学生们一百年，直到今天。

从明末到清末的『西学』翻译只是开始，而且断断续续，并不连贯成为一场『运动』。各种原因导致了『西学』的挫折：被明清易代的战火打断；受清初『中国礼仪之争』的影响；欧洲在1773年禁止了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，以及儒家保守主义思潮在清代的兴起。鸦片战争以后很久，再次翻译『西学』，仍然只在上海和江南地区。从翻译规模来看，以上海为中心的翻译人才、出版机构和发行组织都比明末强大了，影响力却仍然有限。梁启超说：『惟（上海江南）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十种，李善兰、华蘅芳、赵仲涵等任笔受。其人皆学有根底，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，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、李。』梁启超对清末翻译的规模估计还是不足，但说『戊戌变法』之前的『西学』翻译只在上海、香港、澳门等地零散从事，影响范围并不及于内地，则是事实。

对明末和清末的『西学』做了简短的回顾之后，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：二十世纪的中文翻译，或曰中华民国时期的『西学』，才是称得上有规模的『翻译运动』。也正是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，数以千计的『汉译名著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教材。1905年，清朝废除了科举制，新式高等教育以新建『大学堂』的方式举行，而不是原来尝试的利用『书院』系统改造而成。新建的大学、中学，数理化、文史哲、政经法等学科，都采用了翻译作品，甚至还有西文原版教材，于是，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中又多了一种新的标杆，即在『四书五经』之外，还必须参考一下来自欧美的『西方经典』，甚至到了『言必称希腊、罗马』的程度。

我们在这里说『民国西学』，它的规模超过明末、清末；它的影响遍及沿海、内地；它借助二十世纪的新式教育制度，渗透到中国人的知识体系、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中，这些结论虽然都还需要论证，但从一般直觉来看，是可以成立的。中国二十世纪的启蒙运动，以及『现代化』、『世俗化』、『理性化』，都与『民国西学』的翻译介绍直接有关。然而，『民国西学』到底是一个多大的规模？它是一

个怎样的体系？它们是以什么方式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？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认真研究，我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。还有，哪些著作得到了翻译，哪些译者的影响最大？『西学东渐』的代表，明末有徐光启，清末有严复，那『民国西学』的代表作在哪里？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并不能明确地回答，原因就在我们对民国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并无一个全程的了解，民国翻译的那些哲学、社会科学、人文学科的『西学』著作，束之高阁，已经好多年。

举例来说，1935年，上海生活书店编辑《全国总书目》，『网罗全国新书店、学术机关、文化团体、图书馆、政府机关、研究学会以及个人私家之出版物约二万种』。就是用这二万种新版图书，生活书店编制了一套全新分类，分为：『总类、哲学、社会科学、宗教、自然科学、文艺、语文学、史地、技术知识』。一瞥之下，这个图书分类法比今天的『人大图书分类法』更仔细，因为翻译介绍的思潮、学说、学科、流派更庞大。尽管并没有统一的『社科规划』和『文化战略』，『民国西学』却在『中国的文艺复兴』运动推动下得到了长足发展。查看《全国总书目》（上海，生活书店，1935），在『社会科学·社会学一般·社会主义』的子目录下，列有『社会主义概论、社会主义史、科学的社会主义、无政府主义、基尔特社会主义、乌托邦社会主义、基督教社会主义、议会派社会主义』等；在『社会科学·政治·政体政制』的子目录下，列有『政治制度概论、政治制度史、宪政、民主制、独裁制、联邦制、各种政制评述、各国政制、中国政制、现代政制、中国政制史』等，翻译、研究和出版，真的是与欧美接榫，与世界同步。1911年以后的38年的『民国西学』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，而我们却长期忽视，不作接续。

编辑出版一套『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』，把中华民国在大陆38年期间翻译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社科著作重新刊印，对于我们估计、认识和研究『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』、『中国的文艺复兴』，接续当

时学统，无疑是有着重要的意义。1980年代初，上海、北京的学术界以朱维铮、庞朴先生为代表，编辑『中国文化史丛书』，一个宗旨便是接续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『中国文化史丛书』，重振旗鼓，『整理国故』，先是恢复，然后才谈得上超越。遗憾的是，最近三十年的『西学』研究却似乎没有采取『接续』民国传统的方法来做，我们急急乎又引进了许多新理论，诸如控制论、信息论、系统论……还有『老三论』、『新三论』、『后现代』、『后殖民』等等新理论，对『民国西学』弃之如敝屣，避之唯恐不及。

民国时期确实没有突出的翻译人物，我们是指像严复那样的学者，单靠『严译八种』的稿酬就能成为商务印书馆大股东，还受邀担任多间大学的校长，几份报刊的主笔。但是，像王造时（1903-1971）先生那样在『西学』翻译领域做出重要贡献，然后借此『西学』，主编报刊、杂志，在『反独裁』、『争民主』和『抗战救国』等舆论中取得重大影响的人物也不在少数。王造时的翻译作品有黑格尔的《历史哲学》、摩瓦特的《近代欧洲外交史》、《现代欧洲外交史》、拉铁耐的《美国外交政策史》、拉斯基的《国家的理论与实际》、《民主政治在危机中》。1931年，王先生曾担任光华大学教授，文学院院长，政治系主任，后来创办了《主张与批评》（1932）、《自由言论》（1933），组织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』（1932）。他在上海舆论界发表宪政、法治、理性的自由主义，他在大学课堂上讲授的则是英国费边社社会主义、工联主义和公有化理论（见王造时著《荒谬集·我们的根本主张》，1935，上海，自由言论社）。非常可惜的是，王造时先生这样复杂、混合而理想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实践，在最近三十年的社会科学、人文学科中并无讨论，原因显然是与大家不读，读不到，没有再版其作品有关。

我们说，『民国西学』本来是一个相当完备的知识体系，在经历了一个巨大的『断裂』之后，学者并没有好好地反省一下，哪些可以继承和发展，哪些应该批判和扬弃。民国时期好多重要的翻译著作，我

们都没有再去翻看，认真比较，仔细理解。『改革、开放』以后，又一次『西学东渐』，大家只是急着去寻找更加新颖的『西学』，用新的取代旧的，从尼采、弗洛伊德……到福柯、德里达……就如同东北谚语讽刺的那样：『熊瞎子掰包谷，掰一个丢一个。』中国学者在『西学』宝库中寻找更新式的装备，在层出不穷的『西学』面前特别害怕落伍。这种心态里有一个幻觉：更新的理论，意味着更确定的真理，因而也能更有效地在中国使用，或者借用，来解决中国的问题。这种实用主义的『西学观』，其实是一种懒惰、被动和浮躁的短视见解，不能积累起一个稍微深厚一点的现代文化。

讨论二十世纪的『西学』，一般是以五四『新青年』来代表，这其实相当偏颇。胡适、陈独秀等人固然在介绍和推广『西学』，倡导『启蒙』时居功至伟，但是『新文化运动』造成不断求新的风气，也使得这一派的『西学』浅尝辄止，比较肤浅，有些做法甚至不能代表『民国西学』。胡适先生回忆他们举办的《新青年》杂志，有一个宗旨是要『输入学理』，即翻译介绍欧洲的社会科学、人文学科知识，他还大致理了一个系统，说『我们的《新青年》杂志，便曾经发行过一期「易卜生专号」，专门介绍这位挪威大戏剧家易卜生，在这期上我写了首篇专论叫《易卜生主义》。《新青年》也曾出过一期「马克思专号」。另一个《新教育月刊》也曾出过一期「杜威专号」。至于对无政府主义、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、日耳曼意识形态、盎格鲁·萨克逊思想体系和法兰西哲学等等的输入，也就习以为常了。』（唐德刚编译：《胡适口述自传》，北京，华文出版社，1992年，第191页）。胡适晚年清理的这个翻译目录，就是那一代青年不断寻找『真理』的轨迹。三四十年间，他们从一般的人性论学说，到无政府主义、社会主义、马克思主义；从不列颠宪政学说，到法兰西暴力革命理论、德意志国家主义思想，再到英格兰自由主义主张，大致就是『输入学理』运动中的全部『西学』。

胡适一语道破地说：『这些新观念、新理论之输入，基本上为的是帮助解决我们今日所面临的实际

问题。』胡适并不认为这种『活学活用』、『急用先学』的做法有什么不妥。相反，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接受『西学』的方法论，大多认为翻译为了『救国』，如同进口最新版本的克虏伯大炮能打胜仗，这就是『天经地义』。今天看来，这其实是一种庸俗意义的『实用主义』，是生吞活剥，不加消化，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的简单思维，或曰：是『夺他人之酒杯，浇自己之块垒』。从我们收集整理『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』的情况来看，『民国西学』是一个比北大『启蒙西学』更加完整的知识体系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认为『五四运动』及其启蒙大众的『西学』并不能够代表二十世纪中国西学翻译运动的全部面貌，在北大的『启蒙西学』之外，还有上海出版界翻译介绍的『民国西学』。或许我们应该把『启蒙西学』纳入『民国西学』体系，『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』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。

我们认为：中国二十世纪的西学翻译运动，为汉语世界增加了巨量的知识内容，引进了不同的思维方式，激发了更大的想象空间，这种跨文化交流引起的触动作用才是最为重要的。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变得不古不今，不中不西，并非简单的外来『冲击』所致，而是由形形色色的不同因素综合而成。外来思想中包含的进步观点、立场、方案、主张、主义……具有普世主义的参考价值，但都要在理解、消化、吸收后才能成为汉语语境的一部分，才会有更好的发挥。在这一方面，明末徐光启有一个口号可以参考，那便是『欲求超胜，必须会通；会通之前，必先翻译』。反过来说，『翻译』的目的，是为了中西文化之间的融会贯通，而非搬用；『会通』的目的，不是为了把新旧思想调和成良莠不分，而是一种创新——『超胜』出一种属于全人类的新文明。二十世纪的『民国西学』，是人类新文明的一个环节，值得我们捡起来，重头到底地仔细阅读，好好思考。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邀我主编『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』，献弁言于此，是为序。

2016年3月20日，于阳光新景寓所

[法] 賴那克 (S. Reinach) 著 李樸園 譯

阿波羅藝術史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初版



桑西斯托的聖母像，聖母與聖子，以及聖巴巴拉與
彼魯西克斯塔斯第二，拉腓爾作，德累斯頓博物館。

譯者序

任便取一種近代藝術論或藝術史的著作，多多少少總有引用賴那克的地方。

注意賴那克底理論的人，在唯物論者總責備他沒有左傾到底，在比較溫和的學者恐怕又要責備他未免太左傾了罷？在我們底時代，太左太右好像都不大合適，那末，賴那克底態度正合我們底脾胃，似乎也是事實。

這本賴那克一再嫌它太簡約的書，是我個人研究西洋藝術史的一本啓蒙的書；十幾年來我在學習着藝術史的研究，自信也讀了一些西洋藝術史的專門著作，可是，始終覺得這本賴那克並不討厭。

尤其對於想大略地知道一些西洋藝術史的情形的人，這本書是再合適也不大有的，因為，它是用很少的文字，很明白的線索，很公平的態度，給我們說明了從荒古到十九世紀的世界藝術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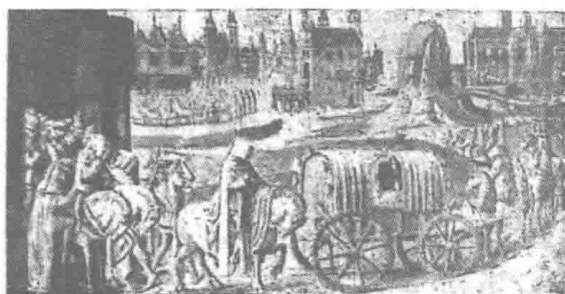
的。

據我個人這一點小小的經驗，深覺得研究藝術如果不明白一點藝術史是不大聰明的，或不大可能的研究法；想做一個藝術家或是藝術批評家是不用說的了，就是想做一個創作家，過去的經驗也是不容忽略的。

根據這種種理由，雖然覺得我底學力不夠，我也大膽地動手繙譯這本書了。動手是在十年前，十年來有興的時候就進行一點，現刻纔把它有頭有尾地完了工。因為動手不是一時的事，脫略錯誤的地方一定不少，我希望着善意的指正，如果它有機會同諸位見面的話。

照例，我謝謝鼓勵我從事這工作的林風眠先生，謝謝爲我繙譯了摩利挨底詩的林文鏗先生，也謝謝在本書出版的交涉上幫了忙的朋友們。

一九三六年三月，朴園。



在倫敦舉行的利查德第二之葬儀，一四八零年從一法國抄本寫而得，在布累斯勞，

原序

除去最後一章是經我再三改正再三重寫的以外，這些講辭，都差不多恰是在我於一九〇二至一九〇三年在盧夫爾學會（Ecole du Louvre）所做的講演中見過的。那些講演樹立了一種用口頭發表的方式，我以為這方式是對於它們的一種功績。講演的人，常從聽羣那兒得到些或是贊同或是反對的回響，那都是對於他很有啓發之工的指導；正好像在講演時記起他們底意見似的，我注意它們以校對這些講辭的印刷校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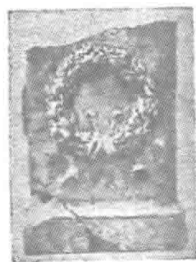
每一種科學所要求的，不止是對於這門學問的博

學，却要求對於這門學問之用文字或用講演的綜合的敘述。在這種敘述上，總括的概念是第一重要的，事實倒是次要的；而在博學的指導上，正如斯泰爾得庫隆日（Fuseli de Coulanges）所說，每一個鐘頭的綜合，要根據一年的分析。自然，這樣一個鐘頭不會人人都有一旦有了，就應當從它得着益處，而且，也使別人從它得着益處。

在盧夫爾學會，每次演講結束的時候，我都大略提起參考書籍，所提的只限於三四種最新的，同必不可少的著作。在發表這些講演的時候，我已經考慮好了使這個要點有一種特別的發展。我很穩健地設置了古代的藝術，因為，我們有很多頗容易找到的，關涉古代藝術的書；我個人也發表過一兩種。可是，甚至於在最大的著作中，觸及中世紀的同現代的藝術的東西却很少。爲這個，我曾設立了一個很完整的參考表，我以爲，它可證明它是很有用處的。經過小心的考慮以後，我決定把所有對於考古學比對於藝術史說得更多的著作，都摒棄不用。除却很少的例外，我同樣把所有在一八八〇年以前所發行的書物，同只能在幾個重要的圖書館找到的，特別巨大特別累贅的卷帙，也都排斥掉。另一方面，我曾很隨便地從好的流行刊物上採取評論，特別是從「純藝術雜誌」（C. A.

Nettes des Beaux-Arts"上摘錄得多，因為，它不但是用很少的錢就可以買到的很流行的東西，尤其是有很好的插圖。要是我底講義只對於初學的人或者無力求學的人有好處，我就希望，在我底參考表裏，就是有很高的藝術教養的人，也可以找到一些東西；就是不能從這參考表中直接得到，他們同樣可以找到那些，因為我討厭碰到那些原名的單調的流水帳，沒有講到，或是僅在這講義中一溜而過的，作品們同藝術家們的。

「阿波羅」這書名，提醒我底讀者們知道，我是有意把它做為我在一八八九年刊行的，「希臘同拉丁底古典藝術」之緒論，同時在四次大量的翻版之後仍能保持它底榮耀的，那本「米納瓦」(Minerva) 底姊妹篇。我希望「阿波羅」能同它底姊妹享受同樣的幸運，並且，希望在傳播藝術史底理論方面，它能給「阿克羅波利斯的米納瓦」(Minerva of the Acropolis) 那古代的先知，號召一些新的羣衆，因為，它並非教我們忽略了對於中世紀同現代藝術的研究，且能幫



第一世紀的羅馬祭

靈，阿爾博物館。

助我們，使我們得到更完美的知識的喜悅。

S. 賴那克